

# 民族融合视野下的熊渠“伐庸、扬越，至于鄂”

郭顺峰 朱艳梅

(江汉师范学院 汉水文化研究基地,湖北 十堰 442000)

**摘 要:**在民族融合视野下,楚民族不断向外征服融合蛮夷诸族,后又逐渐融入华夏民族。熊渠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是楚人楚族大规模征服融合蛮夷诸族的开端。“庸、扬越、鄂”是熊渠时楚人居地周边实力强劲的三大蛮夷之族,庸为群蛮之首,扬越是百越中强悍的一支,鄂本为殷夷后人,统领东南夷和淮夷。此次征伐展示了楚人楚国“近交远攻”“避实就虚”和“适可而止”的战略思维,伐庸而灭其威,进而稳定西北;伐扬越而掠其地、虏其民,进而占领汉南;伐鄂而俘其金,进而打通东南,既加速了楚族与江汉蛮夷的融合发展,也是华夏民族大融合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熊渠;楚;庸;扬越;鄂

**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2-0043-07

《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sup>[1](P532)</sup>这是《史记》中关于熊渠伐庸、扬越,至于鄂这段历史的详细记录。楚熊渠时,楚人楚族居于荆山沮水之地(南漳丹阳),周边方国林立,蛮夷杂居,熊渠首次兴兵为什么要选庸、扬越、鄂呢?

在民族融合的视野下梳理楚民族的形成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楚民族的形成其实是华夏族的一支与土著融合的结果。<sup>[2]</sup>八百年楚国兴衰历史充斥着楚国对四方蛮夷诸族进行征伐、兼并、迁族、融合、灭国、设县的记载,其中熊渠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是楚人楚国最早有正史文献记载的征服融合蛮夷诸族的战争。“庸、扬越,鄂”是熊渠时楚国周边实力最强劲的三族、三国,庸是群蛮的一支,扬越是百越的一支,鄂是东夷的一支,此次征伐可以看作是楚人楚族武力融合蛮夷诸族的开端,也是楚国一次伟大的战略突围。

## 一、熊渠伐“庸、扬越、鄂”的史实探究

(一)庸人是江汉群蛮一族,庸国是当时群蛮中实力最强的方国

庸人是三苗部落联盟被尧、舜、禹三帝连续不断的打击,并最终彻底征服的过程中,避难于鄂西北深山中休养生息的三苗遗裔,荆蛮的一支。<sup>[3](P267)</sup>早期的庸人把屈家岭文化带到了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堵河流域,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创造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青龙泉类型。夏商时庸人所处的汉一丹一堵流域位于夏商王朝核心区的边缘,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文化、二里岗文化和商文化影响较深,<sup>[4]</sup>庸人庸地应该是臣服于夏商王朝,为夏商王朝提供奴隶、盐源、绿松石等资源。在夏商时,庸人就打通和控制了巫溪、奉节,获取了重要的战略和生存资源——大宁盐泉,<sup>[5](P20)</sup>将均县打造成庸侯国的战略前沿,并立足均县,沿汉江向襄阳平原(保康、南漳曾为庸国属地)推进,<sup>[4]</sup>与江汉平原的荆蛮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不乏有盐、铜之类的贸易往来,使得庸在荆蛮中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夯实了庸在西南蛮夷诸国之中群蛮之主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9-12-0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丹堵地区考古新发现与楚文化的关系”(16G111)

第一作者简介:郭顺峰(1978-),男,湖北竹山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商末周初时,庸为西南地区群蛮中实力最强的方国,其疆域也在此时达到了顶点。《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在牧野之郊,聚八百诸侯之军力伐纣,独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单列出来加以训告,其中又以庸为首,足见庸国在当时方国中的地位。此后,“随武王东征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亦皆分别受封为周室屏藩”,而对“各地拥护周室之原来氏族,此类封建大抵就是各民族原有之组织及势力范围加以分封”。<sup>[6](P82~85)</sup>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整理,庸国疆域面积在西周时达到顶点,占据今陕、川、渝、鄂毗邻的竹山、房县、保康、神农架、竹溪、平利、旬阳、安康、汉阴、石泉、紫阳、镇坪、商洛、山阳、镇安、柞水、商南、丹凤、巫溪、巫山、奉节、汉中全境等三十多个市县(市、区)。此时庸国俨然成为地跨陕南、鄂西北、川东、豫西南之大国,是实际意义上的西周方伯之国,成为周王室的西南藩屏,肩负着拱卫中原的重任。

熊渠所伐之庸是在周夷王时,即公元前886年~公元前877年熊渠为楚君期间,此时庸在楚西北,位于周、楚之间,雄踞汉江中上游一带。它仍然是西周王室在西南地区重要的屏藩之国,但由于默许被周征伐的微国在白河、郧县之地建国,<sup>[5](P21)</sup>与西周王室的关系也有了隔阂,熊渠洞察了其中的机缘,首战伐庸。叶植先生认为:“今丹江口市西北至郧县一带,春秋时为庸、楚交界处,西周时为庸国国都,楚攻占其地后即封给长子康,号句亶王,至于春秋时庸国位于今鄂西北竹山一带当是其败退的结果。”<sup>[7](P404)</sup>黄凤春、陈朝霞认为,熊渠封长子康为句亶王,其封地在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并认为此处与熊渠所伐庸地有关。<sup>[8]</sup>综上,我们认为熊渠所伐之庸就在郧县辽瓦店子,此处是庸人庸国的战略前沿核心区,熊渠伐庸之后庸人、庸国才被迫溯堵河而上,到达了竹山县西南的上庸之地。

熊渠首战伐庸,从族群角度来看,庸为群蛮之首;从地域角度来看,庸楚距离最近;从国家角度来看,此战是为了稳定楚国的立国之本,所以伐庸是最为紧迫之事。周成王封熊绎于南漳丹阳之地,早期实为庸国之地,楚人楚国在此经营发展一个半世纪,其实就是在群蛮中谋生存。庸本是蛮族,而且是蛮之大者,已严重威胁到楚国的立国之本,即群蛮是否安心事楚。熊渠伐庸应当是在汉水与堵河交汇处的辽瓦店子展开了决战,庸人庸国不敌于楚,被迫放弃了庸人在汉江中上游的势力范围。此战严重削弱了庸国的实力,缩减了庸国的势力范围,打击了庸国在

群蛮中的地位,熊渠封长子康为句亶王,在此建立了半姓麇国,<sup>[9](P59)</sup>而半姓麇国的建立就是楚族与群蛮融合的典型标志。但庸并没有真正被楚灭国,究其原因,一方面应该是庸国是周王室分封的重要的西南方国,熊渠还不敢轻易灭国;另一方面是熊渠时的楚国还没有实力消灭庸国,或者熊渠只是想打击庸国在群蛮中的地位,逼使庸国不敢干涉伐扬越、鄂的行动。此战以庸国割地(长子康的封地)、退守自保而结束,熊渠伐庸逼使庸人庸国从汉—丹流域退至汉—堵流域,从剑指江汉平原的西南大方国转变成“附楚小国”,卧薪尝胆于堵河流域的群山之中。此战之后“楚至熊渠始大”。熊渠伐庸之后直至公元前611年楚庄王灭庸,庸楚之间一直在明争暗斗。

(二)扬越代表江汉百越一族,是百越中强悍的一支

扬越是先秦时期我国南方一个庞大的古越族支系。史称“越有百种”,除扬越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还有于越、干越、南越、夔越、夷越等称呼,<sup>[10](P80)</sup>在西周时广泛分布于汉水和长江流域以南的大片地区,后随着楚国的兴起,部分越人入楚,大部分越人继续向云贵、两广和闽、浙地区迁徙。古越族也创造了自身的灿烂文化,但最具特色的是他们有着高超的冶金术,而且把持着当时最重要的产铜中心。<sup>[11]</sup>

扬越被大多数学者定位为古扬水流域的越人,应该是可信的。刘礼堂先生考证扬越大致地域为“约今湖北英山—湖南岳阳一线以南,湖北黄梅—江西赣江流域以西、湖南资水以东、广西桂江—广东北江流域以北的范围之内。”<sup>[12](P81)</sup>彭适凡先生认为“扬越的地望不仅包括江汉地区,而且还分布在鄂东南以及湖南和江西的大片地区,其东界大体以鄱阳湖为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以及赣江西岸都系古扬越人的分布范围”。这片地区的扬越,“创造出了既与宗周文化不尽一致,与鄂西江汉地区的楚文化也明显有别,而是一种有着浓厚地区特色的新的文化区类型”。<sup>[11]</sup>

熊渠所讨伐的扬越应该是百越之中在江汉地区扬水流域生活的越人,确切地说在荆州江陵、潜江地区的一支越人。此时的扬越在楚之正南,活跃在汉水下游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是最靠近中原地区的越人族群,与庸、楚、鄂等方国交错杂居。扬越此时虽无君长,但应该是一个部落联盟,而且百越当中扬越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深,手中有铜源和冶金术,把控着与中原乃至江汉地区各方国的铜矿交易。在商代时扬越就为中原地区和各方国提供铜源,商

周王室多次征伐而“俘其金”,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征服了扬越,谁就掌握了铜源和称霸的基础。熊渠伐扬越是此次征伐获利最丰的一战,全面占领了沮漳河流域和扬水流域,把秭归、枝江、江陵、潜江沿线环楚国中心区之地全部鲸吞。扬越一盘散沙,几无抵抗。楚人攻城略地,手到擒来,从此征服了盘踞在扬水流域的越人,并纳入楚国的基本民众,从此楚人摆脱了地不过同的狭促境地;切断了扬越与中原地区以及各方国的铜矿交易渠道,取得了争夺铜源的主动权;绕过“邓、郢、罗、卢、权”等方国直抵鄂,打通了江汉平原腹地的通道——随枣走廊。

(三)鄂人鄂族鄂国是殷夷之后,曾是江汉地区势力最大的方国

鄂人鄂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族姓为姁姓,是黄帝的后代,夏商时已经群居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商末时鄂侯是纣王的三公之一。商末鄂国的地望在今天的河南沁阳一带,鄂国曾经是商王室的田猎之地,与商王室关系亲密。后鄂侯被纣王杀害,西周代商,鄂人鄂国在中原地区生存艰难,就逐步南迁,熊渠所伐之鄂就是已经由河南沁阳、经偃师、穿越南阳盆地、到达随州一带定居的鄂人鄂国。<sup>[13](P44)</sup>从某种意义上说,鄂人也是“殷遗民”,只不过他们是身份比较特殊的殷遗民,鄂人鄂国是周人监管的重要对象。周以对待殷遗的手段来对待鄂国,不仅在鄂设立监官“监之于内”,并且将曾国封在南土与鄂国为邻,以此“监之于外”,对鄂国实行监督。<sup>[14]</sup>鄂人为殷商贵族,殷商本就是以东夷族为主体,周分封鄂人鄂国在此防范震慑南淮夷、东夷,有着“以殷治夷”的意思,但始终不太信任鄂国,也导致了鄂侯驭方联合南淮夷、东夷叛周。

“安州六器”之中的“甗”“静方鼎”“鄂侯驭方鼎”“禹鼎”,以及羊子山出土的诸多鄂国青铜器都证明了鄂国在西周时仍然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侯国,是汉阳地区早于随国的“南土大藩”和“诸侯之长”。<sup>[15](P68)</sup>昭王南征之前,鄂、曾之地就是周王室的军事据点,由周王室直接派兵驻守;鄂侯与周王室曾有联姻之举;周夷王、厉王时,周王室经营讨伐东夷、南淮夷时,出现了从“亲鄂”到“伐鄂”的突然变故。<sup>[16]</sup>据此,学界普遍认为,熊渠“至于鄂”之地应该是随州安居镇附近,<sup>[13](P44)</sup>但蔡靖泉先生认为熊渠“至于鄂”之地在东鄂(今鄂州、黄石境)。<sup>[17](P191)</sup>周王室与鄂的关系在夷王之前应该是非常密切的,但在厉王时发生了重大变故,而熊渠正好选择这个微妙的时间“伐庸、扬越,至于鄂”,这无疑增加了我们解

读此段历史的难度。

《史记·楚世家》中载“熊渠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此句可分解为“熊渠乃兴兵伐庸、扬越”,“熊渠乃兴兵至于鄂”两句,庸和扬越肯定是熊渠兴兵讨伐的对象,但“至于鄂”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率军队到了鄂地鄂国边界,但没有伐鄂;二是伐鄂但不彻底,只是轻扰、警告或宣誓一下。根据学界对《鄂侯驭方鼎》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鄂侯驭方是与周厉王同时代之人,曾在周厉王南征群舒、淮夷班师回朝途中主动前往“坯”地参拜周王,受到周厉王的射礼欢迎,并且赏赐他丰厚的礼物,鄂侯驭方也作器记录此事。<sup>[13]</sup>另据《禹鼎》铭文记载,鄂国是周王亲自发兵消灭的,因为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周王发布命令“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后“获厥君驭方”,与熊渠及楚人楚国无关。《鄂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了周王与鄂侯相会,反映出鄂周至少表面上的友好关系。《禹鼎》铭文则记录了鄂周关系急转直下,鄂联合南淮夷、东夷反叛。《鄂侯驭方鼎》与《禹鼎》是同一时期器物,在较短时间内,周王室与鄂国之间经历了联姻一会晤一反目,这个发展过程表明双方的友好关系早已名存实亡。<sup>[14](P62)</sup>因此,探讨熊渠与鄂侯驭方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版《夏商周纪年》确定,周夷王于公元前885年~前878年时在位8年,周厉王于公元前877年~前841年时在位37年。根据楚国大事纪年表,楚君至熊勇时始有确切纪年,公元前847年为熊勇元年,熊勇是熊延之后,可能是熊渠孙,也可能是熊渠重孙。<sup>[18](P79)</sup>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表述,熊渠是“当周夷王之时”人,有学者推测熊渠是公元前886年~前877年间在位的楚君,同时熊渠应该在周夷王时就完成了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的行动,同时完成了封三子为王的壮举,又在周厉王时“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所以熊渠是跨越夷王、厉王两代周王的楚先君,在厉王早期去世,与鄂侯驭方应该有所交集。鄂侯驭方在厉王时代经历了周王室“亲鄂”“伐鄂”的重大变故,根据《鄂侯驭方鼎》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鄂侯驭方没有发动叛乱之前,鄂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表面上是非常亲密的,鄂国被周王室寄予厚望,希望鄂国在平定东夷、南淮夷之乱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因此熊渠“至于鄂”时,鄂国还是周王室分封在随州安居地区的重要方国,担负着平定夷越之乱的重任,此时的楚国实力还不可能与鄂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sup>[17](P190)</sup>可能只是到鄂国附近骚扰了一下,与伐庸而不灭庸一样,至于鄂



而不攻打鄂。

至于鄂侯驭方为什么先接受周王室的赏赐,不久就联合东夷、南淮夷发动叛乱之事,原因据史无考,但是周厉王剿灭鄂侯,迁一部分鄂人到河南南阳北(后为申国地)便于监管,后称西鄂;一部分鄂人继续向东南出逃至大冶鄂王城,后称东鄂。<sup>[14]</sup>鄂国被灭国和被迁徙首先成就了随(曾)国的壮大,此后随国逐渐发展为“汉东第一大国”;其次成就了楚国,楚国应该与曾国共同瓜分了鄂国旧地,熊渠将中子红封于鄂地,因此称为鄂王,这个鄂应该就是半姓之鄂的来源,也是东鄂的源头。<sup>[14](P59)</sup>而半姓之鄂的出现,标志着楚族对东夷、南淮夷的融合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楚国继续沿襄宜平原进入随枣走廊,向江汉平原纵深挺进,在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之时彻底占领鄂东铜矿。<sup>[19](P88)</sup>

综上所述,熊渠“至于鄂”应该在周夷王之时,此时鄂国与周王室还维持着表面的和谐,熊渠“至于鄂”不可能对鄂大动干戈,但选择的时机非常微妙,是楚国发现了鄂国叛周的蛛丝马迹,充当了伐鄂的先锋,还是借打击鄂国来显示楚国的雄心已不得而知。熊渠深谋远虑,提前封中子红为鄂王,挺进鄂国之地,待周厉王灭鄂、迁鄂之后迅速分一杯羹,半姓鄂国从此诞生,在东南夷、淮夷之中威信大涨,征服了江汉、江淮地区又一蛮夷大族。楚成王时楚国正式取代鄂国,被周王室委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的重任。

## 二、熊渠伐“庸、扬越、鄂”在楚国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熊渠“伐庸、扬越,至于鄂”开启了楚人楚族武力融合江汉蛮夷诸族的序幕,压缩了三大蛮夷之族的生存空间,拓展了楚人楚族的战略空间,充实了楚国基本民众的数量,标志着楚人开始从单一族群向部族联盟发展,即楚人从华夏族的一支开始了与土著诸族的融合。在楚国八百年历史中充斥着楚国对四方蛮夷诸族进行征伐、兼并、迁族、融合、灭国、设县的记载。据何浩《楚灭国考》考证,楚人楚国在春秋战国时灭国共计61个,后有观点认为是70多个,而这些被灭方国大多数是蛮夷之族建立的一方国。

纵观楚史,楚国灭国之后通常采用封王、鲸吞、迁族、设县等方式对原有民族进行融合瓦解,很少采用灭族的方式,足见楚人楚国灭国重在相互融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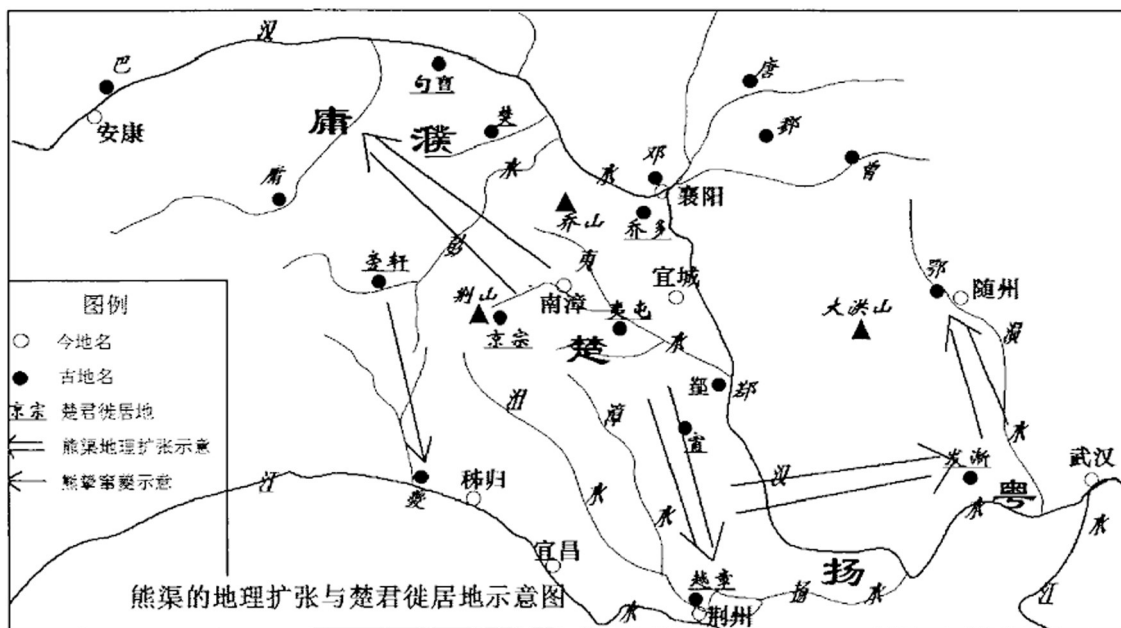
不是亡国灭种,这一点从熊渠“伐庸、扬越,至于鄂”过程中就可以看出。熊渠“伐庸、扬越、鄂”为楚人楚国后来以“启濮”“灭国”“设县”等方式进行民族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战术参考和战略选择。楚人楚国因为熟练掌握了这些战术和战略,才能战无不胜,灭国无数,使得从原本方圆数十里的小国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南土大国。

(一)熊渠伐“庸、扬越、鄂”为楚人楚族武力融合蛮夷诸族提供了战术参考

在此次征伐过程中,熊渠带领的楚师纵横江汉,征服三族三地,积累了丰富的战术,如伐庸使用突袭、山地用兵;伐扬越采用先蚕食、后鲸吞;“至于鄂”之后采用宣誓、袭扰等战术,达到“扬威、掠地、虏人、俘金”的目的,为此后楚人楚族武力融合蛮夷诸族提供了丰富的战术参考。具体如下:

张正明在《楚史》中对此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熊渠伐庸“应为突袭”,但“似乎不甚得手”,熊渠是从丹阳(南漳)伐庸,走的是山路;熊渠伐扬越是先蚕食、后鲸吞;楚师从丹阳(南漳)南下,进入江汉平原西部,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再东下,沿途无险阻。此战打通了江汉平原西部的通道,到扬越就势如顺水行舟了。他认为熊渠伐扬越,终点是鄂(东鄂),伐鄂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占有鄂州、黄石丰富的铜源。<sup>[20](P44~45)</sup>张正明先生的征伐路线可以梳理如下:熊渠伐庸应是取道山路,大致是从丹阳(南漳)到保康、谷城、房县、竹山西南的山道中。伐庸后原路返回丹阳(南漳),再南下当阳、江陵、荆门(扬水流域)一带进入长江,一直顺长江而下到达东鄂(鄂州、黄石)之地。魏昌在《楚国史》中也有类似叙述:“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东鄂,今鄂州市境)。”<sup>[21](P45)</sup>黄锡全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中认为,熊渠进军路线可能是伐庸之后大部队从荆山南麓沿沮漳河南下,向东至江陵,经扬水入汉,再出汉入江(或入湖)至鄂(东鄂)这条路线。<sup>[22]</sup>二位先生一致认为,此次征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占有东鄂地区丰富的铜源。

赵炳清在《楚国疆域变迁之研究》中通过对清华简《楚居》篇中出现的多个地名的推定,详细探讨了熊渠地理扩张的路线,界定了庸、扬越、鄂的地望,并绘制了熊渠的地理扩张与楚君徙居地示意图,也体现了熊渠此战的战术选择。如下图:

图1 熊渠的地理扩张与楚君徙居地示意图<sup>[23](P89)</sup>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赵炳清认为熊渠伐庸、扬越的路线与张正明、魏昌、黄锡全的路线基本一致,不过在“至于鄂”的时候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此鄂为随州安居镇之鄂国,是鄂侯驭方的鄂国。<sup>[23](P90)</sup>在此,笔者赞同赵炳清的观点,即熊渠至于鄂是在随州安居镇。熊渠所伐之庸族庸国中心在郢县辽瓦店子,所伐之扬越一族在扬水流域江陵、潜江,所到之鄂在随州安居镇附近,此战之后,庸人庸族被驱赶至堵河流域休养生息,失去了与楚人楚族争夺群蛮霸主的实力;扬越一族被赶出扬水一带,压缩至长江以南;至于鄂之后,楚人楚族深入到江汉平原腹地,染指淮夷、东南夷的领地。

(二)熊渠伐“庸、扬越、鄂”,为楚人楚族武力融合蛮夷诸族提供了切实的战略选择,即近交远攻、避实就虚和适可而止

楚人楚国是顓頊之后,中原南迁之族,立身于蛮夷之地,要想强大必须依靠和征服蛮夷之民。因为蛮夷之民是楚族的统治对象,是楚国的基本民众,是此后楚民族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必须争取群蛮霸主的地位,才能真正称霸江汉,直至问鼎中原。从熊绎到熊渠,五代六君,历时约一个半世纪,楚人楚族惨淡经营,终于显示了转弱为强的势头,又出现了熊渠这样一位颇有胆识、野心和谋略的楚国大君,<sup>[14](P45)</sup>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是楚君中第一个打破“地不过同”的“子男之田”现状的,也是第一个敢于开疆辟土的楚君,所以熊渠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战略。其具体如下。

首先是“近交远攻”战略。熊渠选择庸、扬越、鄂三地作为征伐、扩张的首选,是因为庸、扬越、鄂是江汉蛮夷中重要的蛮夷之族和方国,是楚族楚国在江汉蛮夷之中的强劲对手,但又离楚地核心区较远。在当时楚国周围还有很多方国和部族,比此三地三国更加接近,如卢、罗、鄢、权、谷、邓、绞等国,熊渠皆绕过并甚得“江汉间民和”,即熊渠与楚地接壤的这些方国和族群交往甚好,远征之时这些方国没有乘虚而入。

其次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楚国周边虽然方国林立,但熊渠选取的庸、扬越、鄂三地三国与楚之间有大片的无主之地,如庸国势力范围到了丹江、房县、保康之地,微、彭皆附庸,但庸国实际上并没有全面掌控这些区域;扬越此时还没有建国,看似分布区域广阔,其实一击即溃;鄂与楚之间,绕过卢、罗、鄢、权之后也是直通襄宜平原,此间也是各方国势力空虚之地。

再次是采取“适可而止”的战略。从征伐结果来看,伐庸而未灭庸,伐扬越只是把扬越赶出了汉江流域,至于鄂只是到了鄂国的边缘之地,并没有与此三族、三国发生殊死战争,更没有灭族。原因就在于熊渠此次征伐更多地是试探和挑衅,讲究“适可而止”,实际是为了“扬威、掠地、虏人、俘金”等现实目的,为今后楚人楚国的扩展和称霸打基础。

(三)熊渠“伐庸、扬越,至于鄂”引发的华夏民族大融合效应

从华夏民族大融合的角度看,无论是商末周初

的方国林立阶段,还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诸侯争霸阶段,楚人楚族楚国面临的民族融合形势和任务都是最严峻和最复杂的。楚人楚国不仅要在方国林立的蛮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与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北方各路诸侯争夺霸主地位,还要稳定后方,维持一个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国内局面。可以说楚人楚国是当时多民族融合进程的主力,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这种客观上的民族融合效应就是从熊渠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开始的。

楚民族的形成及融合大体上经历了从小到大又大到小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楚族向外扩展融合蛮夷各族的过程,后一阶段则是楚族不断被融合到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的过程。<sup>[24]</sup>熊渠“伐庸、扬越,鄂”就是前一阶段的开端,在楚立国江汉流域后,他们立于东西南北之中,介乎华夏、蛮夷之间,由非夏非夷演变为亦夏亦夷,由亦夏亦夷融合而为华夏的南支。楚融合之民族,东有夷族,南有三苗、百濮九黎,西有巴蜀,西北有狄,北有中原之华夏。<sup>[25]</sup>而“庸、扬越、鄂”则分别是三苗南蛮、百越、东夷的一支,成为最早融入楚族的蛮夷诸族,以至于熊渠时楚人就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自居。其具体如下。

第一,熊渠伐庸推动了群蛮与楚族的融合。熊渠伐庸推动了群蛮与楚族的融合,意在争夺群蛮霸主,从而稳定后方,为伐“扬越、至于鄂”解除后顾之忧。熊渠时庸在楚西北,庸楚曾经同处于汉一丹一堵交汇地区,庸靠堵河,楚靠丹江,中间汉水相连,一衣带水,却又相互制衡,可以说庸是楚后方稳定的最大威胁。庸最早在群蛮中立国,后为群蛮之首,为江汉地区最古老的方国。庸人、庸国因助周伐纣有功,被周王室委以西南藩屏之国的重任,统领西土八国,熊渠时庸仍然是西周王室的忠实盟友。庸国地望据十堰市图书馆《影响西周春秋格局的庸国》一文考证,“庸国的地域,以竹山为中心,跨越陕、川、鄂三省,包括今天的竹山、房县、保康、神农架、竹溪、平利、旬阳、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镇坪、城固、巫溪、巫山、奉节等17个县(实际上还应包括十堰市区和郧县、郧西、丹江口等地)”。其东南边境已经达到了丹江(古句瀍)和保康之地,直抵楚国西南边境,极大限制了楚族楚国的发展空间。熊渠时的庸因种种原因,实力有所下降,但仍然挟古国之威、群蛮之首、汉江中上游第一大国的声势,严重阻碍楚国的进一步扩张和楚人楚国征服群蛮的步伐。因此熊渠伐

庸,一战把庸国打回原形,灭了庸人的威名和庸国的威风,把庸人庸国赶到堵河流域,不敢再与之争锋,取代庸成为群蛮霸主,推动了楚族与群蛮的融合,稳定了楚人楚国的根基,为继续伐扬越、至于鄂打下了基础。

第二,熊渠伐扬越开启了楚族与百越的融合进程。扬越,张正明认为是扬水流域的越人,大抵是正确的。扬水,又作杨水、阳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扬水上承接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扬水又东出城西南。”熊渠时西北有庸,东南有鄂、曾等国,周边还有绞、罗、鄢、权、卢、邓等方国密布,独有沮漳河流域和扬水流域的江陵、潜江的大片地区还是被尚无君长的越人栖居,加之越人是最早掌握青铜资源开发和冶炼技术的族群,所以熊渠南伐扬越的根本目的是“虏其人、掠其地、夺其金”。

近人罗香林以为:“楚人略地,本循汉水顺流而南,故先庸,后扬越,后至鄂。扬越界庸鄂之间,则其最早地望,当在汉水流域中部”,<sup>[10](P80)</sup>此说有可取之处。根据熊渠所伐三地的先后顺序,加之鄂已经被定位在随州安居一带,再结合楚人、楚国此时的核心区域在荆山、蛮河流域的南漳(丹阳),扬越应该是在荆山和沮漳河以南,以扬水流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生存繁衍的百越族人比较合理。经此一役,楚人掠地千里,彻底占据江、汉、睢、章的大部分地区,江陵、当阳、枝江等与楚人楚国息息相关之地均在此时被纳入早期楚国西部疆域核心区,<sup>[4]</sup>熊渠及其后继者们以此为基地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熊渠伐扬越开启了楚人、楚国第一轮迁徙和扩张,大批越人融入楚族,是熊渠此次征伐最大的收获,也为“至于鄂”奠定了基础,沿扬越之地向东,绕过横亘在楚、鄂之间的邓、鄢、罗、卢等方国,直抵鄂国,着实令天下方国刮目相看。

第三,熊渠“至于鄂”打通了楚族与南淮夷、东夷融合的通道。熊渠时的鄂在楚东南方向,结合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彻底占领鄂东铜矿的史实,<sup>[19](P89)</sup>此鄂与东鄂之鄂州暂没有关系,根据随州羊子山的考古新发现,已经确认鄂位于随州市安居镇。由此可见,庸、鄂夹楚而居,庸在汉水中上游,在楚西北,扼守丹浙北上中原之通道;鄂在汉水下游,在楚东南,盘踞随枣走廊,庸、鄂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由西到东,如同两面铁壁横亘在楚的扩张道路上。庸为江汉群蛮之代表,鄂为汉东第一大国,统领南淮夷、东夷,它们互为犄角之势,为周王室监视并阻断荆楚、群蛮、百越、淮夷结盟,为安定周之南土起了重要



作用。鄂国是当时此类方国中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方国,是阻碍楚国向东南江汉腹地发展的巨大障碍,也是阻碍楚族与南淮夷、东夷融合的天然屏障。

此外,这种阻碍还体现在鄂国对于鄂东铜矿的控制方面。因为“鄂国所在的随枣走廊西北接南阳盆地,东南通向长江中游地区,而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着大冶铜绿山、瑞昌铜岭等铜矿,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可能就是商王朝为控制长江中游矿产资源而设置的一个据点。从湖北鲁台山西周早期墓葬可以看出,西周在建立之初就对长江中游地区进行了控制,随枣走廊正是中原王朝控制长江中游矿产的重要通道,地处随枣走廊的鄂国因此受到周的重视”<sup>[14](P50)</sup>。可见周王室封鄂在随州安居立国,除了防范南淮夷、东夷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西周王室掌控和提供铜源。虽然扬越控制铜矿的开发和冶炼,南淮夷、东夷把控铜源的运输,但都必须经鄂、曾之地北上中原。不排除鄂国就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铜源,增强了叛周的信心,这也引起了楚人楚国的觊觎,熊渠伐扬越、至于鄂可能就是为了染指鄂东的铜矿做准备,从封中子红为鄂王,到半姓东鄂的建立,再到楚成王熊恽,楚人楚国最终完成了对东夷诸族和鄂东铜矿资源的全面控制。

### 三、结论

楚民族的形成和楚国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楚族不断向外征服融合蛮夷诸族,后又逐渐融入华夏民族的过程。无论是商末周初的方国林立阶段,还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诸侯争霸阶段,楚族面临的民族融合形势和任务都是最严峻和最复杂的。他们不仅要在方国林立的蛮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与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北方各路诸侯争夺霸主地位,还要稳定后方,维持一个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国内局面。可以说楚人楚国是当时多民族融合进程的主力,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民族融合的视野下考证熊渠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这一史实,其实是楚族(华夏族一支)与南蛮、百越、东夷之间的直接互动,是楚人楚族大规模武力融合蛮夷诸族的开端,加速了楚民族的形成。“庸、扬越、鄂”是当时江汉间实力最为强大的三地三国,它们环楚而居,已经成为楚人楚国向外扩张的主要障碍。熊渠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既是图谋已久,更是时势机缘,实现了其“近交远攻”“避实就虚”和“适可而止”的战略意图。伐庸而灭其威,打击其

在群蛮之中的地位,解决后方稳定问题;伐扬越而掠其地、虏其民,解决生存空间问题;伐鄂而俘其金,连通随枣走廊,解决发展空间问题。他们稳定西北,占领汉南,打通东南,从客观上推动了楚族与南蛮、百越、东夷的交流与融合,是楚民族、华夏族乃至汉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第四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 [2]王廷洽.楚民族层次分析[J].民族论坛,1988(2).
- [3]潘彦文.十堰历史建制考[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1.
- [4]陈朝霞.楚国西部疆域演变与民族融合[D].武汉大学,2011.
- [5]郭顺峰.庸人是三苗遗裔,荆蛮的一支考辨[J].鄱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
- [6]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
- [7]叶植.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历史地望问题[A].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C].郑州:河南出版社,1994.
- [8]黄凤春.郢县辽瓦店子与楚句亶王——楚熊渠分封三王地理的检讨之一[J].江汉考古,2010(2).
- [9]郭顺峰.古麇国史新考及与楚的关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 [10]吴永章.楚与扬越、夷越、于越的关系[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
- [11]彭适凡.论扬越、干越和于越族对我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J].东南文化,1991(5).
- [12]刘礼堂.扬越地望考[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 [13]刘亚星.鄂国历史地理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D].郑州大学,2015.
- [14]白晨辰.从文献及考古资料看殷周鄂国的历史变迁[D].河南大学,2016.
- [15]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J].江汉考古,2015(1).
- [16]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J].江汉考古,1983(3).
- [17]蔡靖泉.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J].湖北社会科学,2017(10).
- [18]李守奎.根据《楚居》解读史书中熊渠至熊延世序之混乱[J].中国史研究,2011(1).
- [19]孙继.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 [20]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21]魏昌.楚国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 [22]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J].人文杂志,1991(2).
- [23]赵炳清.楚国疆域变迁之研究——以地缘政治为研究视角[D].复旦大学,2013.
- [24]徐祖祥.楚族的兴衰与汉族的形成[J].华夏文化,2006(4).
- [25]高正伟.楚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J].宜宾学院学报,2007(5).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